



戎马倥偬戍江防

——清末名将李占椿纪事

□穆宇清



李占椿题字的牌匾。

这是一块题于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的祝寿牌匾,匾额上写有“德寿齐辉”四个大字,题写者为李占椿。从匾额上可以得知,李占椿有多个身份,如“广东陆路提督”“奇车博清巴图鲁”等;题词中间上额有篆书朱文“提督广东总兵官印”;匾额边款附近,另有两枚身份钤印,只是年岁久远,毁损不清。

李占椿何许人也?从落款上看,其地位不低、履历颇丰、荣誉加身,是一名位高权重的武官。事实上,他确实是清末一名战功赫赫的将领,在众多史料中都能看到他的名字,特别是清末几场重要战争中,都有他的身影。

他就是赣州兴国的清末名将——李占椿。

慨然从戎 初露锋芒

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李占椿出生在兴国县长冈乡高富村。他出身于一个普通农家,家境极为贫寒,却自幼胆略过人,喜爱军事。与村中儿童嬉戏的时候,就常常划地为营,捡来石头布阵模拟作战。他攻伐指挥颇有章法,很早就展露出在军事指挥上的聪明才智。

清咸丰八年(1858年),湖南“老湘营”到江西募兵,年方十九的李占椿投军入伍,从此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老湘营”是晚清一支重要的湘军部队,由王鑫创立,后由左宗棠统帅。该部队以纪律严明、战斗力强著称,其战绩在湘军中尤为突出。不久,李占椿就因作战英勇,被江西巡抚张芾赏识,委以重任。此后,李占椿在江西、湖南、安徽、河南等地屡立战功,由把总、守备、参将一路升为总兵,还获清廷赏赐“奇车博清巴图鲁”勇号,提督衔记名军机处。

同治七年(1868年),李占椿随西征钦差大臣左宗棠西征陕甘,率军由陕西入甘肃,连战连捷。王鑫去世后,“老湘营”被一分为二,刘松山分领其一。同治九年(1870年)正月十五日(元宵节),刘松山督部强攻马五寨,中弹身亡。“李占椿见统领受伤,手执火包,四面梯登,督各弁丁紧附墙上,纵火焚烧,见贼即斩,寨贼焚死、溺死、坠墙、堕井死者无数,生擒贼目马五,收队缴令。”(《左宗棠全集·奏稿四·刘松山剿贼大胜中炮阵亡现筹办情形折》)

李占椿在战场上果敢勇猛,难免受伤。在一次战斗中“左臂受碾(ào,同炮)子伤穿透”(《左文襄公奏稿》左宗棠)之后,被左宗棠专折保奏,诏赐头品顶戴及黄马褂(清代武官最高荣誉之一)。

正因为李占椿初入伍投的就是湘军,所以他之后的升迁都与湘军实权人物密切相关。前受左宗棠的器重,后有同为湘系封疆大吏的领军人物的刘坤一重用,李占椿的仕途确实称得上“一马平川”。

同治十一年(1872年),李占椿回乡省亲,为江西巡抚刘坤一奏留本省,派为陆路总查兼带镇武昌马队,继任赣标中街营。

1874年5月,日本悍然出兵侵犯我国台湾,攻击了牡丹社和高士佛社等原住民部落。在战斗中,牡丹社头领阿禄父子战死。“牡丹社事件”引发了晚清海防大讨论,最终清廷采取北洋、南洋并举的方针建设近代海防,近代中国海军建设进入高速发展期。

据《同治甲戌日兵侵台始末》记载,刘坤一曾上奏清廷:“又如用人一条,谓法待其人以行,务

在共相荐引。臣以统帅重臣,应由廷推,非敢妄举。至于提镇将领,自可博采旁搜。就臣所知,则有记名提督李占椿,系江西兴国县人,借补游击尚未到任之记名总兵刘光裕,系湖南清泉县人,该二员勇略兼优,且志趣纯实,为武职大员中所难得,可备一时指臂之助。”

刘坤一确实是李占椿的伯乐,不仅爱才用才,而且时时推荐李占椿到关键重要的岗位。李占椿随后的经历,也证明了刘坤一识人的眼光精准。

秣马厉兵 人生高光

光绪元年(1875年)后,李占椿历任两江总督府统带镇东轮拖船总办、沿海查辑事务、阳光镇总兵、广东陆路提督、江西九江镇总兵、福建汀州镇总兵兼带耀德营练兵等职。光绪十七年(1891年)后,先任南京办理两江营务处,统领督标新军全军,后任安徽皖南镇总兵及江南武备副将等职。其间,由于练兵成绩显著,被诏加一级。

此时的李占椿可谓春风得意,不仅诸般荣誉加身,更是屡担要职。但是,这还不是他人生之中真正的高光时刻。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894年11月,两江总督刘坤一被清廷诏令进京,随后获授命钦差大臣节制全军;湖广总督张之洞代为署理两江总督。

刘坤一的处境其实颇为尴尬,徒具空名,并不能真正节制全军。1894年12月30日,刘坤一接受“钦差大臣”任命的同时,奏调李占椿统率果胜军、杨文彪统率健胜军、万本华统率常胜军各5营及陈凤楼统率马队3营、清淮马队2营。李占椿奉调入京觐见慈禧太后,奉命回南京加强江防,秣马厉兵待敌。然而,日军迅速占领了辽东半岛,并计划进一步进攻山东半岛。不久,旅顺失守。李占椿率军北上,行至山东时,正值日军攻打威海卫。

据《清实录》记载,光绪二十年,李鸿章上奏:“……臣即派记名提督李占椿,率自强军陆兵十一营、快炮七位、大炮十位,前往登州、莱州驻扎,布置防务,扼要设防,并与嵩武军会操。”

《清德宗实录选辑》记载,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正月初四,山东巡抚李秉衡上奏:荣城失守,力筹堵御情形。其时,日本兵攻打威海南岸龙庙嘴等处,虽然击沉了敌船二只、雷艇一只,“而南岸改为敌路,情势实为危急。”“现在水师各舰在刘公岛与陆军依护堵击,着即飭令奋力冲击,如能多毁敌船,尚可力支危局。”山东形势已经岌岌可危,亟待援兵,李秉衡点名李占椿、丁槐、万本华、张国林等部援军及东军孙万林部,“为中路进攻威海之师”。此后,李秉衡又电谕反复催促,电报多如雪片。

《清实录》记载,王文韶、李秉衡等人通过电报上奏:荣成、威海的贼寇都已经全部退去,(贼寇)势必将会向北进犯天津塘沽,(而我方)南路的兵力很单薄。经与刘坤一商量,调遣原本增援山东的李占椿、万本华、张国林等率领的十五个营,从沿海快速奔赴歧口、埭子口一带,从而增强兵力。李占椿随后率军驰援,并以十五营布防山东埭子口(无棣县境北部),阻遏日寇想由此登陆直攻北京的企图。

李占椿据守埭子口有功,因此受到清政府的特别嘉奖,光绪帝亲批李占椿奏折,称其“布置尚属周妥”,赏其部白银万两(《光绪朝上谕档》)。

然而,“廿五申刻荣城县失守,威海益迫,恐

旦夕复失”。1895年1月,日军在荣成湾登陆,随后进攻威海卫,很快威海卫失陷,最终导致北洋海军的全军覆灭。

编练新军 成效显著

甲午战争不仅是一场军事上的失败,更对清朝的统治造成了沉重打击,暴露了清朝“中体西用”洋务运动的局限性,表明单纯依靠技术引进和军事改革不足以挽救国家危亡。但是以曾国藩、左宗棠、刘坤一等为代表的湘军,坚定推行军事改革。

李占椿不仅治军严谨,部下多为其旧部,还善于编练新军。光绪五年(1879年)后,李占椿调任福建汀州镇总兵,同时兼任“耀德营”练兵统领。这一时期,清廷正推行“裁绿营、练新军”政策,李占椿作为地方将领,在任内他主导了将地方武装“刘家军”改编为“耀德营”的军事改革。李占椿在“耀德营”推行西式练兵法,引入后膛枪炮替代传统冷兵器,并强化炮术训练。将原“刘家军”的分散游击战术转为正规军制,强化阵地战与协同作战能力。后又编练新军,培养了一批军事人才,如陈光中、刘家成等。因李占椿“练兵成绩显著”,清廷特“咨加一级”(即晋升官阶一级)。李占椿也利用该营维系赣闽交界山区稳定,为后续调任江南提督积累资历。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李占椿被任命为江南提督,授光禄大夫、建威将军,节制江南水陆各镇,总统防太湖水师六营、自强军马步炮队十一营、合字五旗及江阴各炮台,驻节江阴。

自强军是甲午战争期间,由南洋大臣、两江总督张之洞建立的。全军仿德制,带有浓厚的“御侮”爱国色彩,是中国近代新式陆军的开端。自强军步兵用的武器为新式小口径双筒毛瑟枪,炮队2营分别使用德制克虏伯八生后膛炮以及英制麦克七生半后膛炮各6门,马队操练武器主要是长矛。1897年5月1日,自强军邀请驻沪各国领事、驻军将弁170人观操。士兵人人身体,枪械整洁,射击靶标精准;炮队炮炮光洁,炮手动作敏捷;马队进退迅疾,操法自如,令人耳目一新,受到中外各界人士的称赞。

1898年4月,洋合同期届满回国,全归华将自统,李占椿奉命接统自强军。军队营制上增加了江南提督亲兵一哨,为了方便督操,李占椿将8营步兵分为左右两翼,每翼4营。全军在靠近江阴沿江炮台附近择地驻扎,以备有警时与炮台互相策应。1898年9月,两江总督刘坤一谕:“炮台营防军练洋操,每哨由自强军酌拔排长一名充任教习,一切操法都按自强军的章程。自强军调出排长的缺额,由统带另行募补,又将自强军新纂之《西法类编》一书分发江南防军各营旗,责成管哨官诵习。”

刘坤一在《自强军奉调赴东节经布置江防片》中称赞道:“李占椿统兵有年,威惠兼施,廉明笃实,于所部各营军餉银两,无不据实开报,涓滴归公,一洗军营陋习,操守实为可信。”

1901年9月,清廷下旨命自强军“将亲兵一哨仍留下”外,“所有马步炮各营借原领军械等项”调往山东,“袁袁世凯酌量分布和训练”,并入袁世凯的武卫右军。1905年春与武卫右军合编入北洋常备军第四镇(统制为吴凤岭)。

清末新政开启以后,中央收拢军权,清廷先后设立练兵处、陆军部,统一全国练兵事宜,这也使得自强军走到了尽头。

1901年9月,清廷谕令,“自强军调往山东,袁袁世凯酌量分布,督督训练”。自强练兵,终归昙花一现,此后,逐渐并入了北洋六镇。

尾声

随着自己人生伯乐刘坤一的病逝,眼见晚清困局已经沉疴难起,李占椿也心生退意。

光绪三十年(1904年)冬,因旧伤复发,李占椿辞职回籍,1919年病逝于家中,终年81岁,安葬于兴国县激江镇。

不可否认,李占椿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但是,他也是封建王朝的典型武将,既效忠旧王朝镇压民变,又在民族危机中挺身御侮;既统领新军探索现代化,又终因体制腐朽难挽沉沦。他在甲午战争中的战略响应及江南防务现代化实践,是他为后人留下的宝贵军事经验。



“崇宁四年”和“乙酉岁林押”两块铭文城砖

『崇宁砖』与郡守郭知章

□朱坚 赖婷

2023年4月1日午后,铭文城砖研究者心与常雪超在章贡区八境台至涌金门段城墙发现了两块铭文城砖——“崇宁四年(1105年)”“乙酉岁林押”。1105年的干支为“乙酉”,从字体风貌与铭文款式来看,应是“崇宁四年”的另一面,这两块铭文城砖的发现,是自北宋“熙宁二年”铭文城砖以来发现的第二款北宋纪年铭文城砖。

2024年9月6日,江南宋城文化研究院在考察于都老街巷时,在新建巷的一堵围墙上发现一块城墙铭文残砖“乙酉岁林押”,与在赣州城墙发现的为同款。此次的发现,可以推断该批次制砖地为于都,成为可追溯的最早县城制砖时间。但很遗憾,我们并没有在任何史料里发现崇宁四年赣州城墙修城墙的线索,无论是匪乱民变还是水灾地震,史料均未有记载。同时,这款砖的尺寸明显较之其他纪年款要小,仅为6cm×16cm×?(长度未知),明显打破了我们对于北宋城墙砖大而厚的常态认知,甚至可以说是已知纪年款里尺寸最小的。例如:北宋西密尺寸为9.5cm×23cm×39cm;南宋嘉熙戊戌章贡城砖尺寸为9.5cm×19cm×32cm,淳祐乙巳修城砖尺寸为9cm×19cm×34cm;元代至正辰辰赣州路造尺寸为11cm×25cm×42cm;明代洪武“赣州府……赣县提调官……”尺寸为12cm×20cm×40cm,万历丁未尺寸为8.5cm×18cm×34cm;清代道光丁未尺寸为8cm×17cm×34cm,乾隆二年尺寸为6.5cm×15cm×31cm;民国四年重修尺寸为7cm×16cm×32cm。

那么,是何种原因造成了这样的情况呢?

崇宁,赣州后熙宁时代的高光

带着诸多疑问,笔者试图站在更高的维度看那段历史,发现了更真实的崇宁年间的赣州,也或多或少明白其中缘由。

随着北宋“南方水上丝绸之路”的繁荣,赣州城地位逐渐上升,在繁荣发展的北宋熙宁十年里,赣州城迎来了包括刘彝、周廷俊、刘瑾、元积中、张颢等能力卓著、政绩有声的名臣,迎来了在全国285个州军级城市中全国商税收入排第18名的高光,特别是在熙宁九年修西河浮桥正式开启扼守章江收税赋的时代。于是,在34年后的崇宁年间,赣州人口剧增至近30万户,赣州城(除南安府外)共有27243户,人口702127,并于大观元年(即崇宁五年)从“上郡”升为“望郡”。

如是,我们大胆设想,这样一个经过历代勤官的治理,迎来经济繁荣的崇宁时代,没有任何修城记录,却有体积明显不符合时代特征的铭文砖传世,唯一理由就是:确实没有天灾,没有人祸,天下太平城无大恙。如是,只是表面修缮,无需动城墙根本,时任郡守仅仅是例行职责,做了一些对城墙修修补补的事,如此“崇宁四年”砖体相较于其他城砖更小就说得通了。

郡守郭知章与阳考本

纵观北宋晚期的赣州城,因为城市的重要性,调任赣州的官员几乎都是朝廷中坚,虽然很多都是贬官至此,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治理的能力和眼界自然不凡。

但是,我们却未在《赣州府志》或县志里,找到任何关于崇宁年间官员任职和相关事迹的记载。只在通天岩题刻中发现一品赣县县令许贲(仙游人,元祐六年进士)的题刻,“赣令许贲来游 崇宁四年二月”。在查阅大量其他史料后,才发现崇宁年间只有郭知章知赣州。

郭知章(1039年—1114年),字明叔,北宋宝元二年(1039年)生于光化乡岭上(今遂川县粤田镇城溪村),治平二年(1065年)进士。初入刘彝广西幕府,后历任会昌、浮梁、分宁县令、监察御史等职,并曾兼知太原府、开封府、邓州、成都、虔州等地,食邑九百户。于政和四年(1114年)病故,宋徽宗派人致祭,赐谥号文毅(江西省博物馆镇馆之宝之一,就是郭知章墓出土的宋徽宗御赐御仙花纹金带板一套,计13块)。

《宋史·纪事本末·卷百二十四》记载:崇宁五年四月丁丑:臣僚言“伏观知江宁府徐杰、知虔州郭知章、新知漳州陈次升、知福州朱俊俱在正月庚戌。是四人也,皆元祐奸党,诬逐宗朝,附会邪党。今任以牧守,尚典方面,岂能奉行法令,体朝廷继述之意哉?舆论纷纷,咸以为典刑若此,恐非所以明是非、示奸恶于天下。若行放以官祠,尚为优幸。”诏:“朝请大夫、知江宁府徐杰提举崇福宫,朝请大夫、知虔州郭知章提举鸿庆宫,朝奉大夫、新知漳州陈次升提举明道宫,朝散大夫、知福州朱俊提举洞霄宫。”如此,我们基本可以明确,崇宁五年四月,因为在崇宁三年被列入元祐党一案,被发配到虔州的郭知章,再一次被贬为提举鸿庆宫的闲职。

在郭知章去世76年后,“半个赣州人”周必大在《题郭知章告身》一文中称其为“古之名臣”;右内翰郭公自玉堂出帅南阳告身一通,其曾孙积中得于浸清之余,携以相示,乃为重装,且节录史本传于后。观公始末,亦可谓古之名臣矣。惟绍圣以来,权臣用事,居官路者人知其难。既晚入党籍,则大略固可考云。绍圣元年十一月五日,少保、充醴泉观使、益国公周某。

虽然,没有查阅到郭知章在赣州的修城资料,但在馆藏的《苏阳二公夜话碑》拓片中读到了一篇碑文,上面记载了杨时(曾任虔州司理参军,时任浙江余杭县)替郡守郭知章向朝廷举荐乡人阳考本的荐文。而该事件亦被宋史记载。《苏阳二公夜话》碑中的杨文靖公代郡守郭知章(章)荐状内容与《集部》记录基本相同。《集部·杨时集》载:代虔州举阳考本右臣猥以非才,谬当郡寄。窃惟事君之义,莫尚于人,而不祥之实,蔽贤有知。苟有所知,臣敢不勉?伏见虔州进士杨(勘误,应为“阳”)考本,学富行纯,为舆论信服……伏望圣慈不以臣言之轻,特加收采,锡之一命,以称朝廷尊德励善之实。这件事,同样被《宋史》记载:“阳考本……崇宁中,太守郭知章以德行优异荐于朝,举八行,解褐国子录,再转博士,以直秘阁。”

那么,为什么推举阳考本的事,要一个远在余杭任知县的杨时代为?

大观元年(1107年)三月甲辰,宋徽宗开八行取士,诏:“善父母为孝,善兄弟为悌,善内亲为睦,善外亲为姻,信于朋友为任,仁于州里为恤,知君臣之义为忠,达义利之分为和;孝、悌、忠、和为上,睦、姻为中,任、恤为下。”此时,知虔州郭知章已然又被贬鸿庆宫,而推举阳考本的事只能委托余杭任上的好友杨时代为。

在这块极其特殊的“崇宁四年”铭文城砖的背后,我们看见了朝野官场的动荡,自熙宁变法以来到元祐党争,朝堂之上你来我往不可开交,一大批名臣发配流落岭南,包括郭知章在内的诸多重臣,都因为受到冲击而与赣州结缘,但毫不影响他们的励精图治兢兢业业,让这远在岭南边陲的赣州迎来了属于自己的繁荣和安宁。



李占椿在埭子口指挥作战。(AI配图)

